

断代区域饮食社会史的多维观察

——王利华先生《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读后

朱学良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3-0139-06

王利华先生致力于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的理论构建与学术实践已二十余年,《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是他的发轫之作,最近该书经三联书店再版梓行(《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三联书店,2018年。第一版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以下简称《变迁》),嘉惠学林。笔者精读过《变迁》首版,受益匪浅,再次捧读新版,对于王先生有关中国生态环境史的整体思考和对饮食社会史个案研究的精雕细琢,又有了深刻的理解,特撰文谈几点自己的阅读感想,与学界分享。

一、多维观察:广阔与多元的学术视阈

《变迁》一书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广阔多元的学术视阈。这是王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沉潜于农业史与社会史研究而产生宏观历史认识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将饮食、社会与生态环境融为一炉,用新思维进行历史整体考察的学术实践。自新时期饮食史与饮食文化研究复兴以来,一大批与饮食相关的通史、断代史、地域史、门类史著作相继产生。但以笔者所接触到的文献来看,这些著作多是史实的考证与陈列式的叙事,满足于历史拼图的简单还原,而复杂历史运动的深层肌理尚待剖析。

《变迁》首开断代区域饮食社会史研究先河,全书时间定位于公元3-9世纪,地域限定在广义的华北,即东起于海,西至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北达长城一线,南则以淮河—秦岭为界,约略相当于通常所谓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①。在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揭示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主要变化必须具备广阔多元的学术视阈。《变迁》的谋篇布局与阐释路径恰是其广阔学术视阈的最好证明。全书除引言、结语外共分七章:第一章讨论中古华北的自然环境,叙说自然环境的整体特征、气候冷暖干湿变化、森林植被状况、陆地野生生物、水文环境与水产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波动情况。生态环境是人们展开社会活动的自然基础,本章为后文的讨论提供了知识背景。第二章讨论植物性食料的变化,叙述中古之前华北地区的食物体系演变与定型、黍粟麦与水稻等五谷主粮比重的变化、蔬菜水果等品类的增加。第三章讨论动物性食料的变化,讲述畜牧经济的波动、畜牧产品结构的变化、畜产品的输入、渔猎及野味的采集。这两章统摄于“食料生产结构变化”专题之下,揭示出中古华北生态、社会变动与农牧经济消长、种植业和畜牧业内部结构性调整之间的关系,勾勒出食料变化的生动图景。第四章讨论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谈及五谷、果蔬、肉类加工与调味品酿造的技术方法,并特设专节讨论豆腐问题。第五章讨论膳食结构和烹饪

[收稿日期] 2019-05-06

[作者简介] 朱学良(1980—),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生态文学等。

^① 此处时间区间定位即为“中古”,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空间定位是广义的“华北”,而非现代行政区划的华北。见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三联书店,2018年,第2页。

技艺问题,论及食品的烹饪、主食和菜肴的种类与结构变化,并涉及燃料问题。与二三章谈吃什么相比,四十五章谈的是怎么吃的问题。第六章讨论中古饮料革命,描述中古饮料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包括酒的品类与酿造、茶的北传与风行、乳品与浆饮的兴衰问题。本章谈喝什么的问题。第七章以白居易为个案,讨论中古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嬗变之关系,对白居易饮食生活中的食品、偏好、交游、食养等方面介绍,展现中古士人阶层的饮食风尚流变。通观全书,所涉及的史学领域有饮食史、农业史、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借鉴和使用了农学、生态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此多元的学术视阈交融于一部学术著作,且彼此间互不扞格,足见王先生统筹驾驭多领域知识与方法的学术功力。

与多元学术视阈交融相呼应的,是《变迁》独卓高拔的学术命意。著者明言:“本书努力区别于一般饮食史书的那种‘陈列式’叙事,不求获得‘叙述全面’之类的好评,而是尝试采用‘因应-协同’的思想方法,将众多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综合思考,重点揭发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主要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古整体历史变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解饮食生活变化所映射出来的宏大的中古历史运动图景。”(第8页)这就是说《变迁》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立足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从生态与文化角度出发在变动的时空中综合考察人们饮食活动与生态环境、文化行为“因应-协同”不断变化之关系,展现中古历史运动图景之一面,也是探讨人类活动与文化、生态互动之历史关系的一般规律。由此命意,我们看到的虽是中古华北,但知晓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与核心区域,就会明了考察中古华北的饮食、生态、文化间互动变迁,具有从断代区域到通观全局的价值与意义。从中古的变动到近世的稳定,漫长的600年是不断动态调试的600年,“没有中古,何来近世”;广义的华北是从秦汉到中唐中古中国的“基本经济区”^①,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没有华北,何来中国”。

《变迁》自首版发行以来,它的命意与范式也为后来的学术著作提供了范例,区域饮食史研究蓬勃展开,而且地理、生态因素逐渐成为饮食文化研究中多维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如姚伟钧《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等都是地域饮食文化研究中加入了生态环境的考量。这足以证明《变迁》一书广阔多元的学术视阈所产生的学术影响。

二、求实通变:探索与求解的问题意识

历史,是一个含有过去式意味的词,我们回看历史仿佛一切都是静态的,其实它本身也和当下现实生活一样鲜活生动,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撰著《史记》的宏愿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在求实通变的基础上,给出史家对历史变化的解释,可见这是一流史家的终极追求。《变迁》一书难能可贵的是求实通变的问题意识,“企望能在求‘实’的基础上求通其‘变’”,“讨论重点集中于彼时彼地饮食生活和文化较之前一历史时期的若干重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第5页)再现或者复原历史面貌固然重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历史运动的本质则更能展示史家的才与识。

刊落饮食外在的浮华,其内核是人类对食物营养的需求,这是永恒不变的;变化的是作为“文化动物”的人和与之交互影响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人通过其创造的文化向自然生态环境获取食物营养的手段、方式与方法。《变迁》考察中古华北饮食史,解释中古华北主粮结构变化过程就是围绕这一主轴展开,充分体现了求实通变的问题意识。中国的主粮向来以“五谷”涵盖之,虽然具体内容或有变化,但基本不出黍、粟、麦、稻、麻、菽六种。黍、粟这两种原产于中国的作物,常为“五谷”之首,中古之前的千百年间它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xi页。

们的地位从未动摇过。麦是外来引进作物,在先秦时期虽已跻身“五谷”之列,但还属于黍、粟的附庸。这三种作物是中古之前华北地区主粮的基本内容。但两汉以降中古华北地区的主粮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麦逐渐上升为主粮,黍、粟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古华北从“粒食”转为“饼食”(面食),形成“北方吃面”的常识性认识。《变迁》对黍、粟、麦主次易位与升降变化的阐述是从三种作物的植物性特征、生态环境变化和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考察。黍、粟的耐旱特征适合华北地区台地平原的旱作农业,其与杂草的竞争力强,适于垦殖和复垦的土地;麦类需水量大,适宜种植于华北地区的平原低田。《变迁》把握作物的植物属性,从人地矛盾发展状况出发,准确描述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口从华北台地平原向平原低湿土地扩张,麦类在环境适应性上明显超越黍、粟,两汉之后展现出强劲的扩张性。这是环境变化、土地开发、人口增长带来的协同发展、演进变化的结果。但主粮作物竞争的背后还有社会经济、技术的因素,《变迁》揭示出麦作的扩张与黍、粟的收缩在中唐之后经“两税法”被国家以经济制度的方式所确定这一基本事实;更用“互见法”揭示出中古华北地区水力资源远较当今优越,借助于水力的磨、碾等谷物加工方法普及,也让麦从蒸煮粒食变为发酵面食,获得更佳的口感而胜出。“北方吃面”这一看似简单的常识,经过此番解释,它背后的生态、技术、文化因素的变化都呈现于读者眼前。

求实通变不仅仅表现在求真,更在于去蔽。“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是国人“习焉而不察”的常识,“南方吃米”的印象或许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但“北方吃面”则是中古华北主粮结构变化之后留给现代人的深刻印象。但这一常识是否一贯正确?《变迁》基于北方温带的光照、气温和土壤等均非制约水稻种植的因素,只要灌溉良好的地方都可种植水稻的事实,考察中古华北的关中、西北、河东、河北、河南及淮河流域的水稻种植情况,给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中古北方也曾经广泛种植一种“嘉禾”——稻。面对当今华北地区水资源紧缺的现实,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变迁》考察中古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盐碱治理、水稻种植,发现三者的三位一体关系,解释了中古华北大面积水稻种植的可能性,这是中古华北主粮结构变化方面的重要发现。而随着华北地区水资源条件的不断恶化,灌溉水源短缺,水稻在中古之后与麦、粟等作物竞争中逐渐退出了华北地区。这给今人留下了华北亢旱,不适合稻作的主观印象。《变迁》中这些看似常识的构建与颠覆,其实质是揭示中古时期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协同、交互作用的变化过程,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在评述《变迁》中求实通变的学术努力之后,我们需要补笔的是,正当王先生撰写《变迁》时,黎虎先生也在领衔编撰《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黎著全景式的展现中古饮食史,且较以往的史著增加饮食学板块,留给相似学术著作的空间已经不多,甚至可以说几无余地可言。而《变迁》紧扣一个“变”字,新意迭出。这不能不说是“求实通变”的问题意识让《变迁》更具学术生命力。我想这就是王先生夫子自道的“在前人思想的缝隙作思考”的具体体现^①。

三、慎择标尺:技术与艺术的完美呈现

《变迁》致力于解说中古华北长时间段、广阔地域中的饮食文化变化,涉及大量生态与人文的内容,需要选取恰当的个案——衡量标尺——加以讨论,以呈现中古华北饮食变迁过程。王先生对于个案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自身对于专业技术性和人文艺术性的不懈追求。

动植物与人类共存于生态环境中,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决定着特定时空环境中动植物与人的活动边际,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可能性,当然也决定了人类饮食文化生活的基本形态。对中古华北生态环境的考察是《变迁》不可缺少的部分,通常我们判断生态环境好坏的标尺是地表植被状况,但用于考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则出现了困难。因为很难在中古时代的文献中找到关于植被状况

^① 王利华、曹牧:《学术人生在摸索和坚持中前行——王利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的科学客观的数据,用来说明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这需要史家具有极高的专业技术知识,用锐利的学术眼光找到恰当的衡量标尺,说明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一般状况。

《变迁》第一章中作者把中古华北鹿类动物作为个案和衡量标尺,他言到:“鹿类动物是野生食草动物中的一个典型种类,对食物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其分布区域和种群数量的变化,综合反映了中古华北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森林和草地的盈缩。”(第39页)所界定的鹿类动物包括麋、獐、麋和梅花鹿,所用的材料是《唐六典·户部》《通典·食货典》《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中北方各地土贡鹿产品的记录。经过细密的分析向我们复原了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活动的状况,说明中古华北地区相较于今天具有更好的生态环境。还不仅如此,这还为后文阐述中古华北畜牧业变化埋下伏笔,在解说中古华北食肉问题时揭示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尚未驯养家猪之前,鹿曾经是当时华北地区先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只是因为未能被人类驯养,加之被过度猎杀及生态环境恶化而数量不断下降,几至灭绝。可见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历史考察,若是没有此等专业技术知识和锐利的学术眼光恐怕只会用空洞的言语描述一般状况,而没有这般细致犀利的分析。

《变迁》除了选取“物”作为衡量标尺外,还将视角转向“人”,将唐代诗人白居易作为分析中古士人饮食文化嬗变的个案。这是王先生避免饮食生活史和文化史过度注重物质技术层面,而成为“一堆枯槁的碎骨”,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还历史以血肉的学术努力(第322页)。选取白居易为分析个案是他精准学术眼光和恰当学术的具体表现。白居易因其宦游南北的丰富经历、贯穿儒释道的饮食交游圈、大量记录饮食生活的闲适诗,成为中晚唐文人雅士的典型代表,是中古时期通过个人饮食生活考察大时代饮食文化嬗变的不二人选。著者分析白居易诗歌发现,其虽为北人胡种,但饮食并非“食肉饮酪”,而是“饭稻羹鱼”且“茗饮”,可见白居易个人的饮食习惯是“南方化”的。从中古前期北方士人对“饭稻羹鱼”、“茗饮作浆”为代表的南方饮食的斥拒,到中古后期对南方饮食习惯的追随和传布,也可窥见贯穿中古时代的南北文化势位转移带来的文化效应。

饮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获取营养的自然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王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分析白居易的饮食交游活动,通过白居易的饮食馈赠和聚会宴饮等具体活动,展现中古后期的文人雅士如何将饮食上升为社交与审美的日常活动。又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食药一家、医食同源,对白居易的疾病和营养问题研究又是切入中古时代饮食与医疗的最佳入口。白居易的个案研究能揭示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古时期饮食生活风貌,这可与陈寅恪先生以韩愈为个案论唐代学术文化之走向相媲美,陈寅恪《论韩愈》一文云:“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之人物也”。^①王先生在收尾之时用“形而上”指陈氏以韩愈为个案的文化学术研究,用“形而下”指自家以白居易为个案的饮食文化研究,巧妙设喻对比足见其智慧与幽默。

在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学术个案精当选择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部学术著作的人间情怀。以鹿类动物为个案的研究,不仅仅是《变迁》的夺人先声;以白居易个人饮食生活为个案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变迁》的曲终奏雅,它们是王先生个人撰史情怀的体现,是其“求索中国文明之根和中国自然的文化之魂”,从“物的世界”过渡到“情的世界”的努力^②。

四、圆融综合:自然与人文的合理汇通

《变迁》不唯开区域饮食史先河,亦着生态环境史先鞭。环境史家伊懋可在访谈中言及环境史的范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332页。

^② 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后记”,三联书店,2013年,第413页。

围时曾说:“要把象王利华的《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这一类的著作看成是环境史的一部分”^①。当今环境史已是显学,但在上世纪90年代王先生撰写《变迁》时,国内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甚至他在以《变迁》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会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②这非但不影响《变迁》的学术价值,更彰显了王先生的学术预见力。以“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为旨归的环境史更需要汇通自然与人文^③,《变迁》也做出了良好的学术示范。

由于环境史源自生态科学关于人种史之理解的一些含义的认识^④,生态学和现代生态思想是环境史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渊薮,所以优秀的环境史著作大多借助生态学沟通自然与人文。《变迁》在描述中古华北动物性食料变化时,考察农牧经济的波动情况,清晰的描绘出中古华北畜牧经济发展的“抛物线”与农耕经济发展的“反抛物线”,即:魏晋南北朝畜牧经济上升农耕经济下降;魏晋南北朝之后畜牧经济下降农耕经济上升。中国传统农业定型期——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呈现出农重牧轻“跛足农业”的特征,但中古华北由于自然、社会、人口、经济、民族、政治等诸多原因,已经使农牧趋于平衡,之后又深度回归“跛足农业”。王先生运用生态学中“林德曼效率”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生态系统中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从低营养级到高营养级逐次递减,形成“生态金字塔”。据此生态学基本定律,考虑中古华北实际情况,估算出每平方公里土地出产农耕植物提供的热量所供养的人口数量是放牧动物提供的热量所供养的人口数量的10倍。故而中古之后地狭人众的华北不得不回归“跛足农业”。王先生并不止步于此,他还回应了“汉化”的问题。中古时期进入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渐慕华风,放弃游牧“食肉饮酪”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转而定居农耕,与汉族生业模式、文化传统趋同。以往研究将游牧民族文化定义为“落后文化”,将汉族文化定义为“先进文化”,“汉化”就是落后的征服者为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所征服。王先生强调立足于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更需要注意生业方式变化,导致文化的其他方面最终也必然要发生相应改变,而不是单纯争论华夷之间的“先进”与“落后”。“文化-生态”解说更有力的回应了虚空的泛泛之论,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进路。

若是环境史过度借重自然环境概念,忽视社会环境研究,是否也可称为“跛足环境史”?王先明教授曾言:“没有‘社会环境史’的历史,将不是完整的社会历史;同样,没有社会环境史的内容,也建构不起真正完整的‘环境史学’。”^⑤《变迁》很好的避免了这一偏颇,因为《变迁》的题目设计就是“结合农史知识做社会生活史问题”^⑥,其中对茶在中古华北传播的研究,就是从社会环境史角度探讨茶如何从区域性饮料上升为全国乃至世界性饮品。茶这片神奇的树叶原产于中国西南一隅,饮茶习俗两汉以前流行于巴蜀地区,两汉以降传布于长江中下游,中唐之后风行华北进而转向西北,最终盛行全国。这个传布的过程大约持续了近千年,仅仅中古前期茶的北传也徘徊了几个世纪,《变迁》在考察生物、自然、政治、经济诸因素之后,特别提出文化因素,即中古时期南低北高的“文化势位差”导致这个结果。中唐之前华北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高于南方,特别是北方胡族和“胡化”贵族盛行“食肉饮酪”,虽闻南方“茗饮作浆”,也因为文化势位不同而抗拒之,视茶为“酪奴”,称南方饮茶之人“漏卮”,将北方仿效南人饮茶者嘲为“逐臭之夫”。但随着隋唐统一帝国形成,南北文化对立减少交流加强,中唐之后南北文化渐趋平衡,“文化势位”的落差消泯,茶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王先生借用传播学理论,考察茶传布的历史文化环境,融通人文与自然,将饮茶传播的个案分析得极为透彻,避免了环境史研究的弊端。

《变迁》本质上是长时段、广地域的饮食社会史研究,其中沟通自然与人文的个案研究或许并不是王

①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② 王利华、曹牧:《学术人生在摸索和坚持中前行——王利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③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④ [美]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⑤ 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⑥ 王利华、曹牧:《学术人生在摸索和坚持中前行——王利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先生有意为之。明确环境史研究方向十余年之后,对竹子个案以一部书来剖析而形成的微观环境史著作《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三联书店,2013年)则是紧紧围绕“人竹共生”展开,这可以说是王先生有意为之的学术方向了^①。可见一个学者的学术理念从隐到显、从晦到明不能仅仅看近因,更应注意到它萌发的远源。

五、学术建构:本土与域外的兼容并蓄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轰”出中世纪之后,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多是在西潮激荡之下更生、发展,虽有过短暂辉煌,但也有附于骥尾的尴尬。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再度开启,各种域外时髦理论纷至沓来,学人硬搬用域外理论解析中国问题,其实不过是用中国材料为外国理论作注脚,优者尚称圆融,劣者皮肉不亲。《变迁》将本土研究与域外理论兼容并蓄,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问题。

《变迁》立足于真问题,兼容中西理论,在饮食社会史的研究中独辟蹊径。饮食看似是生活中寻常琐事,在我们这个人口庞大且可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的国度里不可轻忽。但令人遗憾的是,传统时代的饮食研究多是救灾备荒的形下实学,难与诂经证史的形上玄学抗衡,即使有士大夫涉足饮食研究也不过是其侈靡生活的花边缘饰而已。现代学术中饮食研究的地位有所提升,特别是第二轮“新史学革命”之后^②,借助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学术领域逐渐开阔,渐成显学。

作者自云治史的起点和中心点是“历史上的人们如何填饱肚子、维持生命”^③,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真问题。作者自言《变迁》所用的知识和方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学(包括作物学、畜牧学、林学、食品加工及其支撑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等等),二是生态学,三是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此外还受到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一些影响^④。农学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一门古老学问,从先秦到现代有着丰富的学术积累。百年之前传入的人类学是触发第一轮“新史学革命”的诱因之一,百余年的学术历程也早已促使其本土化;生态学理论用于治史是新生学术。《变迁》兼容三者,立足于“人类生态系统”^⑤研究饮食问题,做到了用新方法解决真问题,例证无需再举,之前论述已见其荦荦大端。

《变迁》立足于本土学术兼容域外理论,也为作者之后的学术转型与建构中国生态环境史提供坚实的基础。融汇中外的学术研究是知易行难的实践,熟谙本土研究明确问题导向之后,才可借助域外理论,否则理论只能悬空,犹如手握屠龙刀而无龙可屠。我们上文揭橥《变迁》属于环境史著作,其实作者自言“最初的思考不是受西方环境史的影响”,是“基于问题本身的逻辑需要”。《变迁》的学术追问源自作者十余年沉潜中国农业史研究和对历史地理学的喜好,与生态学理论相遇合,是“文化热”大潮中“乱看一气”的结果,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⑥。正是本土研究与域外理论的接榫,才使《变迁》上升到第二轮“新史学革命”层面,否则《变迁》的学术路径还无法超越借助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饮食社会史的常规操作,还在第一轮“新史学革命”的余波中徘徊。《变迁》中所涉及的农牧林业史、历史地理学、气候史、灾荒史等知识领域也是作者倡导构建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⑦。商量旧学,涵养新知,才能构建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体系,形成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下转第131页)

① 赵九洲:《环境史研究的微观转向——评〈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

②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③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自序”,三联书店,2018年,第1页。

④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自序”,三联书店,2018年,第24页。

⑤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⑥ 王利华、曹牧:《学术人生在摸索和坚持中前行——王利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⑦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与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